

首先是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引导全党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增强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自觉性,将“两个维护”真正落到实处;其次是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引导全党上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研读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权威的重要论述,做到从思想深处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的领导核心权威,归根到底还要靠完善的制度规定和坚决的制度执行,故而还需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力保障领导核心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8]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热卢博夫斯卡娅.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M].何清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10]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4]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5]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0]吴志军.试论拨乱反正时期权威理论的重塑与演进[J].中共党史研究,2016(8):51-66.
- [2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2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2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 [25]韩洁,刘红霞,齐中熙,等.领航定向 破浪前行[N].人民日报,2020-12-09(1).
- [26]王岐山.全面从严治党 承载起党在新时代的使命[N].人民日报,2016-11-08(3).
- [2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9]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30]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1]刘先春,孙志程.论“两个确立”的四重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4):32-40.

(编辑:陈越)

理论回瞻与价值重构: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家庭伦理的深度考察与现代价值

林丽婷

(福建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家庭生活中的性爱、婚姻、夫妇关系等伦理维度,对资产阶级家庭伦理进行系统剖析和批判,从而对未来家庭伦理进行建构。他构想一种以现代之爱为婚姻的道德基础,强调妇女解放及男女真正平等,婚姻充分自由的新家庭形式。研究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具有重大价值效应。新时代家庭伦理建设要守正创新,验证、发展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为当代家庭生活伦理建设提供方法指导;解放思想,培育科学的家庭观念,强化新时代公民家庭道德建设;立足现实,聚焦现实生活新特征和新问题,正确处理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关系;观照主体,宣扬妇女解放,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产阶级家庭伦理;价值效应

中图分类号:A811;B8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784(2024)05-0009-06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内部的伦理关系不仅关乎个体的幸福与成长,更映射出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和价值取向。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场,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家庭伦理关系出现某种程度的异化,即在资本主义的浪潮下,家庭伦理关系逐渐被金钱和利益所侵蚀,家庭伦理观念的变异不仅是社会经济必然产物,更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笔者将详细探讨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家庭伦理的批判及他构想的一种新的家庭伦理形式。研究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也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之家具有重大价值效应。

一、解构: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家庭伦理道德危机的洞察与反思

沿着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生活的伦

理思想和伦理规范将继续发生变化。尤其是到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家”的危机与家庭正义问题也日益凸显,恩格斯对实践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生活本身进行洞察与反思。恩格斯指出,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变化,表现在2个维度,在资产阶级内部,资产者的家庭生活伦理表现为一种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在资产阶级外部,无产者的家庭伦理关系反而比较进步,这些分析是恩格斯建构其家庭伦理观的现实基础。恩格斯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伦理失范和伦理悖论进行洞察和反思。

(一)性爱:“理”对“情”的滞碍与扼杀

性爱伦理是婚姻关系及家庭生活的道德基础。恩格斯对现代性爱进行科学界定,他指出:“现代性爱,同古代人的单纯的性需求,同厄洛斯(情欲),是根本不同的。第一,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1]90}。这表达了现代性爱不仅是简单的性欲或性冲动的表达,还需要从对象性逻辑来考察

收稿日期:2024-06-06

资助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FJ2021MJDZ003);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FJJKCG20-088)

作者简介:林丽婷,女,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男女双方是否存在持久性的相互爱慕。可以说,恩格斯所理解的现代性爱是以相互爱慕为基础的两性之爱,是“情”与“理”的辩证统一。在他看来,伦理之爱的实现程度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有关。过去的一切世代对于“性爱”的理解都是有偏差的,现代性爱与动物的性本能根本不同,又与古代和中世纪的性爱需求有本质的区别。古代的夫妇之爱是男女双方主观的爱,是构成家庭关系的客观义务。中世纪的骑士之爱是一种不道德的婚外之恋,本质上是一种不道德的通奸行为。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性关系如何?如果从性爱的角度考察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道德性,资产阶级家庭是否以现代性爱为婚姻缔结的前提就是关键。

恩格斯认为,资产者的性伦理观念,实际上是对我们日常习惯性认为婚姻是以“爱”为基础性爱观念的讽刺,因为他们仅仅把妻子看作是一种生产工具。“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34} 马克思恩格斯不想粉饰资产阶级的性爱观,并对其进行揭示和批判。在他们看来,资产者性爱的伦理性特征在现实的资产者家庭生活实践中被消解,资产者的两性关系表面上是相互爱慕的性爱关系,实质是虚伪的两性之爱,是“理”对“情”的窒息与扼杀。因此,从现代性爱的视角看,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是不合情理和不道德的。

总之,在过去的任何时期,性爱都不构成婚姻的基础,爱情对婚姻的缔结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作为家庭生活主观性环节的性爱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家庭财产的异化关系所遮蔽,异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二)婚姻:家庭婚姻的伦理本质及伦理性目的的隐退

婚姻生活是恩格斯考察资产者家庭伦理失序的中心问题。《起源》中,恩格斯从2个方面分析了资产阶级婚姻的伦理尺度缺失的经济根源。

第一,“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婚姻的伦理本质被“伪善的公妻制”所遮蔽。在恩格斯之前,黑格尔就从法哲学角度对缔结婚姻的伦理本质进行规定。黑格尔指出:“婚姻,也就是按本质说是一夫一妻制,是任何一个共同体的伦理生活所依据的绝对原则之一。”^{[3]209} 但是,婚姻“一夫一妻制”的伦理性本质规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很容易遭遇危机,有时甚至是资产者主动放弃的。马克思恩格斯说道: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乐趣。”^{[2]50} 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淫游制度讥讽了资产者表面上的“一夫一妻制”,资产阶级婚姻的伦理本质又倒退到“伪善地掩盖着的公妻制”。相反,资产者还要正言厉色、颠倒黑白地歪曲说共产党人要实施公妻制。

第二,资产者缔结家庭婚姻的伦理性目的异化为权衡利害的契约婚姻。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称:“婚姻的伦理方面在于双方意识到这个统一是实体性的目的,从而也就在于恩爱、信任和个人整个实存的共同体性。”^{[3]203} 有关这一婚姻的伦理性目的的洞察,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现实的资产者家庭生活中的婚姻关系却并非如此,男女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达到统一。在恩格斯看来,资产者缔结婚姻的主要形式有2种,“在天主教国家中,父母照旧为年轻的资产阶级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2]83-84} “在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2]84}。可见,作为家庭生活的客观性起点的婚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出于对家族利益或阶级地位的考虑,当事人都会从现实的经济利益出发去选择婚姻伴侣,婚姻不是双方个人意愿的统一,婚姻本身的伦理性目的被隐退,变成是一种权衡利害的契约或交易。资产者大多数情况下要顺从父母的安排,企图通过缔结婚姻来获利。

那么,资产阶级的婚姻,为何必然遭遇婚姻本质的异化及婚姻的伦理性目的倒退?恩格斯总结道:“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把这种结婚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1]9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对一切社会关系进行改造,包括婚姻关系。它把所有东西都当作商品,包括资产阶级婚姻的缔结,也仅且是一种法律上确认的“自由”契约关系,实质是一种从理性视角来计量婚姻利益得失的做法,导致婚姻本应具备的恩爱和信任等伦理性目的的扭曲。经济理性背景下,经济至上主义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婚姻的标准。正如路易斯·杜蒙特在《从曼德维尔到马克思:经济意识形态的起源和胜利》一书中提到,“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需要——则是次要的”^{[4]19}。这样,婚姻的物质需要考虑就远超婚姻关系的伦理考虑,婚姻就降格为夫妻双方仅按照契约而相互利用,家庭生活表面的和睦就会成为一种偶

然或虚伪。

(三)性别:“家庭奴隶制”凸显了家庭生活伦理的性别歧视和阶级压迫

在资本主义的家庭生活中,由于男女双方自然分工的差异及妇女在“生活资料及必须工具的生产”中的地位之衰退,形成了妇女表面受尊重而实际地位低下的家庭生活状况。对此,恩格斯革命性地用阶级压迫来阐释家庭生活中的两性关系。“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是相当于无产阶级。”^{[2]87}从阶级视角看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妇女由于经济地位低下,妇女劳动常常被局限在家庭领域而成了家庭的奴隶,在家庭奴隶制中充当被剥削的角色。她和普通娼妓和按计件工作的雇佣女工不同的地方在于,她从结婚伊始,就把自己的身体一次性出卖给家庭,妇女的家庭劳动对男子的社会劳动而言就是附属品。

当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当妇女作为社会劳动力进入社会生产线后,她们并没有因为经济收入的提高带来社会地位的提高,恰恰相反,妇女地位更低了”^[5]。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受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奴役和压迫。简言之,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实践是一种不正义的性别分工,男女双方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不同的道德角色。从性别伦理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是不道德的。

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生活关系早已出现伦理冲突和矛盾,各种家庭、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如家庭生活中的性爱、婚姻、夫妇关系等的伦理性目的都被消解或遮蔽。并且,恩格斯还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生活不幸的根源。在恩格斯看来,家庭伦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构建起真正符合伦理要求的家庭生活。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家庭伦理观的批判,为他提出科学的家庭伦理观奠定现实基础。

二、建构:恩格斯对未来家庭伦理的建构设想

在厘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生活的伦理性目的的异化后,恩格斯构想了一种新的家庭形式,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家庭以性爱为基础,强调性别平等。在这样的家庭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金钱关系,而是基于相互尊重和情感的联系。他指

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家庭伦理观念的演进必须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理想的家庭伦理生活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候家庭生活将实现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

(一)婚姻的道德基础:现代之爱

从婚姻的自然属性方面来看待婚姻本身的伦理性,则必须关切爱情是否为婚姻的基础。恩格斯强调,尽管专偶制家庭具备了产生现代性爱的基础,但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爱仍是被排斥的。反观无产者家庭,相互钦慕作为性爱的道德内涵在这里有所反映,性爱成为无产者家庭生活的常规,无产者家庭比资产者家庭更早实现真正的“专偶制”。当然,只有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家庭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婚姻的伦理性目的,男女将在现代性爱基础上步入美好的婚姻家庭。

恩格斯指出,既然专偶制是由于经济原因而非现代性爱的自然原因所产生的,那么,当私有制消灭,生产资料实现社会所有的时候,专偶制是否需要退出人类历史舞台?他给出否定的回复。在恩格斯看来,到那时,专偶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完全地实现。他充满激情地展望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形成全新的两性关系伦理秩序。他回应道:在未来家庭中,“一个在专偶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1]90}。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家庭生活的伦理性本质体现在男女的性关系伦理之中,男女双方会保持爱慕的持久性,会克制和压抑这单纯的自然冲动的一面,会因出轨而感到羞怯,表达爱的真挚性,实现了真正的“专偶制”。《起源》指出,“这一代男子一生中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1]96-97},妇女也将忠于爱情,而不受经济因素的牵制。这就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婚姻的本质,即真正的专偶制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家庭不实行共妻制度,随着私有制消失而伴随的卖淫的消失,公妻制也就消灭了。届时,资产阶级旧家庭关系和旧风尚也将自然解体,家庭生活将更为和睦。总之,性爱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会随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

(二)婚姻家庭全新的道德标准:妇女解放及男女真正的平等

《起源》中,恩格斯始终把妇女家庭地位的考量作为其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论述。恩

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考察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根源,妇女家庭地位的差异主要是夫妻在家庭生活及社会分工中的经济地位的不同造成的。

早在恩格斯之前,资产阶级学者普遍表达出对于妇女在家庭中的伦理地位的偏见。如黑格尔在论述家庭的一般伦理道德要求时指出:男子“在家庭之外有另一个伦理活动范围。女子的归宿本质在于结婚”^{[3]207},主要原因在于“妇女当然可以教养得很好,但是她们天生不配研究较高深的科学、哲学和从事某些艺术创作,这些都要求一种普遍的东西”^{[3]208}。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甚至认为由妇女治理国家是件危害极大的事。那么,如何有效破除他们在家庭伦理观问题上存在的性别歧视,以推进妇女解放?恩格斯认为,如果单纯消除由于等级秩序造成的家庭观念歧视是不够的。各个历史时期妇女地位的变迁与妇女在“两种生产”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真正的解放妇女,必须把妇女问题放入人类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视域下探究,把经济因素作为实现妇女解放的切入口和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必然要求。他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181}。适当参与社会生产将消解妇女家庭伦理地位的不公正。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提出妇女重新回到社会的经济单位的条件,即在全社会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家庭劳动也日益转化为社会的公共事务,而不是把压力集中在妇女个人身上。到那时,妇女在家庭中将不再依赖丈夫,她们将获得真正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真正的专偶制家庭才能真正实现,家庭中男女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现实。

(三)家庭婚姻的道德权利:充分自由

恩格斯指出,从古代到资本主义,男女双方都是在父母的安排下缔结婚姻。婚姻的缔结不是当事人决定的事情,而是家族利益的考虑。尤其是资产者的“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但在阶级内部则承认当事者享有某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1]95}。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婚姻自由只停留在表面,自由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如果说资产者具有形式上的自由婚姻,那么无产者的婚姻就是一种事实上的自由婚姻,或者是至少部分地实现了婚姻自由,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

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2]42}。无产阶级更多是以爱情为基础而结合的婚姻,因而,无产者的婚姻更合乎道德。当然,充分自由不仅包含自由缔结婚姻,而且包括离婚的自由。有关离婚自由的伦理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婚姻本身应视为不能离异的,因为婚姻的目的是伦理性的,它是那样的崇高,以致其他一切都对它显得无能为力,而且都受它支配”^{[2]204}。但是,在恩格斯看来,婚姻不应离异伦理性原则与家庭生活实践间是相互矛盾的。恩格斯指出,这一矛盾的化解将有待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不仅自由缔结婚姻具有伦理意义,夫妻情感瓦解后的离婚也具有伦理价值,他主张夫妻可离婚,但应当慎重考虑。《起源》指出:“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1]96}

三、意义:恩格斯家庭伦理观的价值效应

尽管恩格斯阐述的家庭伦理理论的时代背景与现代社会差异较大,新时代的家庭结构和功能等也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充分挖掘和吸收借鉴恩格斯家庭伦理思想中的理论意义和文化意义。恩格斯的家庭伦理思想中蕴含丰富的爱情伦理、婚姻伦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思想,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伦理内容。新时代重新挖掘恩格斯家庭伦理观的理论光辉,对当代的家庭伦理研究及构建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价值引领。

(一)守正创新:验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从恩格斯对人类史前史家庭生活的起源及其家庭伦理关系发展规律的解析,到恩格斯对今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家庭生活的非伦理性的剖析和解构,再到建构科学的家庭观,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贯穿《起源》的一条方法论主线,也是恩格斯家庭伦理观的哲学基础。但是,长期以来,“两种生产”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长期遭受误读,尤其是面对恩格斯坚持用“两种生产”理论来分析人类社会婚姻伦理规范变迁的原因时,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物质生产或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否定,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一种依次决定论或者先后决定论的观点。事实上,仔细研读《起源》,“两种生产”

理论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还验证了恩格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一以贯之。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史前史早期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关系,他们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即在特定发展阶段上(人类史前史时期),人口生产是作为物质生产的独特表现和实现方式,这是由人类社会整体发展不成熟决定的。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原始社会独特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家庭既是重要的生育单位也是重要的生产单位,人口生产本身具有独特的经济作用 and 意义。”^[6]“两种生产”之间不存在内在矛盾冲突,相反,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验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当然,《起源》的价值不仅在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家庭伦理的起源及家庭伦理发展的方向,而且在于使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活的社会生活实践研究中的成功运用和辉煌检验。学习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我国当代家庭生活伦理问题的根源,它为我们提供了方法指导。如恩格斯坚持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看待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庭伦理观的变革,坚持在对传统“贞节观”进行扬弃的基础上看待今日两性关系伦理,等等。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告诉我们,理想型的婚姻家庭是与共产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样,理想的婚姻家庭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是逐步实现的,只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进步。构建现代化美满家庭的目标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分不开的,需要协同推进。

(二)解放思想:培育科学的家庭观念,强化新时代公民家庭道德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性,强调应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以及家风的建设工作。恩格斯的家庭伦理思想,对新时代开展家庭伦理观教育,强化新时代公民家庭道德建设具有重大启示。恩格斯坚持把家庭发展史看成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在他看来,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在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这就对家庭的社会历史性特征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论证”,这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家庭关系看作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造成直接冲击,促进了人们对家庭观念的根本扭转,实现家庭伦理关系的革命。家庭伦理关系的生

成、发展与消亡过程,验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对于我们了解人类对家庭伦理认识的发展过程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家庭伦理观。同时,恩格斯的家庭伦理思想启发我们,家庭伦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家庭伦理规范。新时代的家庭伦理观念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第一,新时代婚姻家庭的构建轴心应由亲子向夫妻伦理关系适当转移,加大对新时代婚姻伦理问题的关切。在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中,婚姻关系伦理占据重要地位,婚姻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反观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普遍把亲子关系看作比婚姻关系更为重要的维度,婚姻伦理关系则处于从属地位。事实上,夫妻关系是人伦的开始,也是建立家庭的前提。因此,当代的家庭伦理建设,我们要在承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上,对传统儒家家庭伦理思想取长补短,借鉴吸收。如对中国传统的“孝”伦理、传统的“贞节观”等观念进行扬弃,强化对家庭夫妇伦理等问题的关切。第二,新时代婚姻家庭伦理应从工具理性向价值性特征转变。《起源》中,恩格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家庭生活的伦理性目的的辨析中,家庭的工具性特征都超出了家庭的价值性目的。如在个体婚制家庭中,普遍把能否生育看作是妻子是否失德的一个重要衡量尺度,妻子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被看成是对家庭义务的履行,否则就有被“休妻”的可能。又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是一种阶级教育,资产者的婚姻是一种契约、资产者家庭的妇女是“家庭第一奴隶”等,这些家庭伦理原则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家庭的金科玉律。当然,《起源》中,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婚姻家庭的价值性特征及其伦理性目的有着高度期待。

(三)立足现实:聚焦现实家庭生活新特征和新问题,正确处理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关系

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详细论述的“两种生产”理论,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而且对于我们构建新时代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具有深远的重要性和指导意义。立足我国家庭生活发展现状,当前我国家庭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问题,依据“两种生产”理论,归根结底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辩证关系。例如,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的,符合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物质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社会的人口生产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新时代要

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7]28} 在“两个大局”的宏观背景下，保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首要任务，而且是回应人民对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为我们理解出生率下降等问题提供了科学视角。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强调，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的制约。在当前社会，家庭制度、社会保障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例如，高房价、高教育成本以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都会影响家庭的生育率。“两种生产”理论启发我们，在关注物质生产的同时，要积极关切人口生产问题，如积极应对“生育率下降”等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包括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减轻家庭生育负担、加强生育政策的引导等，以促进“两种生产”协调发展，保障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观照主体：宣扬妇女解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当代的家庭生活中，尽管妇女的家庭地位获得极大的提高，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促进了由于私有制的发展所形成的妇女地位下降、“男尊女卑”的家庭文化的消解，这为构建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今日社会，仍存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及妇女是否应该“回归家庭”的思想，男女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为当代社会存在的妇女应“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太太以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新问题提供了合理解答方案。正如戴维·麦克莱伦所言：“这本书尤其对妇女解放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8]13}

《起源》中，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历史根源，他从“种”的生产和社会生产的角度，指出经济因素是妇女家庭伦理地位变迁的最为核心的因素。在恩格斯看来，妇女解放需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紧密相连，要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挖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作用。当私人的家务变成社会的事业，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时，妇女就能够真正成为家庭和主体，逐步获得解放。当前，不管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还是“回归家庭”的选择，均忽视了女性自身成长和独立的重

要性。正如《起源》所指出的，妇女解放的前提是消除私有制和阶级剥削，让女性能够平等参与社会生产。因此，女性应努力提升自我，保持经济独立，这不仅关乎个人尊严，也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基础。同时，女性的价值在于多元选择和自我实现，而不应过多受传统“回归家庭”观念束缚，女性无论是选择回归家庭还是在职场奋斗，其价值都不应被单一标签所定义。全职太太的贡献同样重要，她们在家庭中的劳动价值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社会应建立健全的支持体系，为全职太太提供必要的保障和尊重，消除对她们的偏见和歧视。恩格斯曾引用傅立叶的一句话：“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9]276}

当然，妇女问题的真正解决，不能仅靠家庭生活中性别不平等狭隘观念的改变，而有赖于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妇女问题要放到社会问题的视域中解决。恩格斯的妇女观对我们促进女性发展和家庭地位的提高提供依据和方向，如女性可以通过受教育、积极参与社会生产、获得经济独立、与男性共同承担家庭事务等，使作为家庭主体的男女在家庭和社会贡献中进一步实现自身价值，促进建构真正具有伦理意义的家庭。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4]杜蒙特.从曼德维尔到马克思:经济意识形态的起源和胜利[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7.
- [5]李包庚,陆汉锋.论恩格斯的妇女观及其时代价值[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28-37.
- [6]王峰明.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历史发展: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互文性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0):69-82.
-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8]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4.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编辑:陈越)

DRGs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下住院医疗费用控制效果研究

唐丽婷, 李长乐

(福建医科大学 卫生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分析 DRGs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对住院总费用、住院天数、个人自费和实际补偿比的影响, 研究选取 2019—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某三甲医院患者住院医保费用结算数据, 观测值共计 291 469 个, 采用间断时间序列分析, 基于分段回归模型检验改革前后相关指标的变化趋势差异。结果显示, DRGs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显著降低住院总费用(住院总费用平均每月减少 45.70 元)、缩短住院天数(住院天数平均每月减少 0.03 天)、降低个人自费(个人自费平均每月减少 31.04 元)、提高实际补偿比例(实际补偿比平均每月增加 0.09%)。鉴于 DRGs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在住院医疗费用控制方面显现出的良好效果, 政府应继续推进和深化 DRGs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关键词: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住院费用; 费用控制; 分段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R19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784(2024)05-0015-06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增加, 医疗服务需求不断释放。加之医疗技术的飞速进步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 医疗需求不断增长, 特别是住院医疗费用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公立医院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由 2014 年的 7 832.3 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10 315.8 元, 增幅为 31.71%。同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由 2014 年的 8 133.6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28 208.4 亿元, 增幅为 246.8%。基于此, 如何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 尤其是住院医疗费用, 成为当前政府、社会、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1]。

理论上,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医保支付方式是一种病例组合分类方案, 综合考虑年龄、性别、住院时长、临床诊断、病情、手术情况、疾病严重程度、并发症、转归等多方面因素, 将患者分入若干诊断组, 然后根据大量同类病例的费用数据统计确定费用标准。一旦费用标准确定, 医疗保险机构便按照病例的分组结果预付医疗服务提供者相应组别的标准费用, 而不再受实际发生费用的影响。

DRGs 医保支付方式的实施, 可以引导医疗机构合理控制医疗成本, 减少诱导性医疗费用支出, 提高医疗质量, 从而减轻患者经济负担^[2-3]。

实践中, 随着付费方式由传统的按项目付费向 DRGs 医保支付方式的转变, 医疗机构可能因不善于成本管理而面临亏损压力, 从而导致一系列损害病人利益的行为, 如推诿或选择病人、将费用转嫁给患者自行承担、降低出入院标准及采取保守治疗策略等^[4]。此外, 医疗机构在实施 DRGs 医保支付方式时, 医疗机构可能在分组时高编高靠, 即通过调整诊断与手术代码等手段获取更高支付; 以及分解住院, 即将本应单次完成的诊疗过程拆解为多次, 以获取更多医保基金支付^[5]。

2023 年底, 全国超过 90% 的统筹地区已经开展 DRGs(或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但是, 由于各地区改革方案的政策设计和实施环境呈现出显著的特异性, 学界对于 DRGs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在国内推广效果的全面评估, 尚缺乏足够证据的研究解释, 现有的研究结论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不一致性^[6]。因此, 本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某三甲

收稿日期: 2024-08-09

资助项目: 福建医科大学高层次人才项目(XRCZX2023009)

作者简介: 唐丽婷, 女, 福建医科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20 级本科生。研究方向: 医疗保险。

通信作者: 李长乐, Email: changle.li@fjmu.edu.cn